

* 院 史 *

怀 念 稼 夫 同 志

庞 真

(遗传研究所)

〔提要〕 本文回忆张稼夫同志 1952 年底到 1956 年上半年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期间的一些情况：如亲自动手起草《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在科学院加强学术领导，筹建学部；认真执行团结科学家的政策；培养和关心青年科学工作者以及稼夫同志本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作风，深切表示对稼夫同志的怀念之情。

稼夫同志不幸于 1991 年 5 月 29 日与世长辞，至今已整整两年了。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他那高尚的思想品德，慈祥的音容笑貌，直到现在仍不时涌现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忘怀。

我和稼夫同志是在 1944 年冬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会上相识的。时值抗战后期，稼夫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他代表分局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我是作为中共晋绥八地委机关选出的学习模范参加这次盛会的。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次亲自聆听了他内容生动、含意深刻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还听说他和我是同乡，更是倍感亲切。

1949 年 3 月，稼夫同志奉调到中共西北中央局任宣传部长。临走时，从晋绥分局党校抽调了我和其它三位同志随他到了延安。不久西安解放，我们都到了西安。1953 年初又随他到北京工作，一直到 1960 年才离开他。

现值稼夫同志逝世二周年之际，特就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撰写此文，以寄托我的怀念和哀思。

深厚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工作方法

1952 年底，西北局宣传部通知我所在的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说张稼夫同志已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要我给他去当秘书。当时我很激动，对能够在我景仰的稼夫同志身边工作，感到特别高兴。于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启程赴京。我是 1953 年初到科学院的，这时稼夫同志正忙着筹备访苏代表团的工作，不久，他就和钱三强团长一起率团访苏去了。他走后，科学院党组工作，由秦力生同志（办公厅主任）临时负责，党组成员有郁文同志（办公厅副主任）等。我一方面管党的机要工作，一方面帮助他料理家务。

稼夫同志在党内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在西北局工作时，在讨论研究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时，常常用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来加以阐明，在干部中就有“西北局的理论家”的誉称。1953 年 5 月从苏联回国后，他没有立即回到北京，而是在长春停下来，一方面主持起草访苏报告，一方面在东北分院各

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返京后,于7月召开了所长会议,进一步掌握了院内各研究所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亲自动手起草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他是把苏联科学院的先进经验同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研究和确定工作方针和任务。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对钱三强、武衡等同志向他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决定取舍,还让我们查阅有关的书刊。有一次,他让我查列宁讲的“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句名言的出处,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问题。他在研究了中国科学院的现状后,认为必须坚决改变当时行政领导多,学术领导少的偏颇状况,积极主张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聘请国内的著名专家、学者为学部委员,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各学部只管学术,不管行政事务。在如何加强学术领导的问题上,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就是照搬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在科学家中选择院士、通讯院士,由各个学科的院士、通讯院士来组成学部,对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稼夫同志认为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实行院士制度还不成熟,不能照搬照抄。实践证明,他的这个建议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稼夫同志草拟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经党组多次讨论、修改通过后报送中央,受到中央的重视,经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后,批转全国各有关单位。中央在转发报告时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团结科学家的楷模 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良师

稼夫同志在科学院工作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团结科学家这个重要政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党中央对科学院的重要指示和党对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是靠他和党组的成员同科学家们充分协商,统一思想认识,才付诸实施的。稼夫同志对郭沫若院长非常尊重,常常到郭老家中汇报请示工作,有几次重要的党组会议,就是在郭老家中召开的。他对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几位副院长也都非常尊重,有事总是亲自到他们办公室面谈,关系十分融洽。他常嘱咐我们:共产党员在科学院工作,就是要关心和帮助科学家做好科学研究工作,为他们创造顺利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且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士为知己者死”,只要我们真诚地帮助他们,他们就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才智。他以身作则,亲自做科学家的思想工作,听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段时间心情不舒畅,他就登门拜访,为他排忧解难,华罗庚很感激。他很重视在知名科学家中发展党员,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就是由他介绍入党的。他为了帮助科学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访苏回来不久,就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登在1953年9月号《科学通报》上,题为《谈苏联科学家怎样掌握并运用马列主义经验》。稼夫同志刚到科学院时,各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都是由该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担任,许多行政事务压在这些科学家身上,致使他们不能把全部精力用到科学研究方面,再加上科学院的党员干部很少,党员科学家寥寥无几,党的工作十分薄弱。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稼夫同志积极向中央建议抽调一批党员干部来科学院工作,充实到院部各职能机构,到研究所当副所长、办公室主任或专职人事干部,曾用党组名义向中央提过数次调干名单。这

个建议得到当时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的大力支持，随后陆续从部队和地方上调来几批党员干部，先后数十人。

在各研究所党的力量得到逐步加强的情况下，为贯彻执行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批示的精神，更好地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党组于1954年分工由郁文同志筹备，召开了科学院的第一次人事工作会议。稼夫同志在会上作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由郁文同志组织几个调查组到北京、上海、南京和东北的研究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由郁文同志亲笔起草，经党组会议讨论修改才定下来的。《报告》回顾了建院以来党的工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论述了今后的任务及工作方法。会议还交流了工作经验，制订了人事工作的规章制度，从而提高了院、所党组织和人事部门的工作水平。这次会议对团结科学家，加强党的工作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稼夫同志刚到科学院时，不断收到秦元勋等一些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来信，信中热情地向稼夫同志反映他们的思想和要求，提出许多改进科学院工作的意见。稼夫同志对这些来信非常重视，他仔细看过后，让我分别交给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为了回答这些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青年》（半月刊）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谈谈有关掌握科学技术的一些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我和王修同志提供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由稼夫同志逐字逐段地进行修改的，有些重要的段落由他全部改写。他用极其关心和爱护的口吻，充分肯定了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主流，说：“我们今天正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以空前浩大的声势，向着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进军，如何更多更好更快地掌握科学技术，已成为当前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普遍的迫切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必然的、正当的、合理的，也是完全符合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接着指出：“掌握科学技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很好地掌握科学技术光凭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必须有坚定的正确的立场，虚心的诚实的态度和坚定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他还针对部分青年中存在的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以及把政治和业务对立的思想倾向，进行耐心的分析和语重心长的开导和教诲。他特别告诉青年们“对待老科学家、老工程师和老技术工人，要虚心地向他们请教，要经常地在政治上帮助他们，做到彼此团结和‘教学相长’，为提高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奋斗。”这篇文章对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至今读起来还倍感亲切。稼夫同志为了培养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还吸取苏联科学院“中心环节是培养干部”的经验，委托党组成员武衡同志组织起草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经过党组和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修改定稿，于1954年8月经国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此后即成立了院研究生委员会，在人事局下面设立了研究生处，负责指导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并于1955年9月开始进行科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录取了50名研究生（分属45个专业）。这次招收研究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大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情。

忘我的工作精神 俭朴的生活作风

稼夫同志在科学院工作期间，白天忙于开会、找人谈话、阅读文件、处理工作、拜访科学家，常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处理当天的公文或起草参加会议的发言提纲。公文再多，当天的事办不完他是不睡觉的。他审阅公文非常认真细致、总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连标点符号也

不放过。他起草的发言提纲,用语严谨,逻辑性强,只要将他的发言一句一句地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党组开会的时间,一般也都是安排在晚上,常常开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散会。他的工作如此繁重,而生活上却是十分俭朴的。每天粗茶淡饭,什么刀削面、拉面、拨鱼儿等等家乡面食,是他最喜欢的。炒菜,只是一些普通的菜蔬。他工作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有时到了开饭的时间,连催数次,都不就餐,厨师只好把饭菜热了放冷,冷了再热。

稼夫同志身体素质比较差,年轻时患过肺病,一个肺已经萎缩。由于工作过于繁重,到1955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支持不住了。这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党中央对科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956年1月14日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四部分,着重讲了科学工作,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还提出了制订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这时,稼夫同志已经力不从心,主动向中央提出接替他的人选。中央考虑到稼夫同志的健康情况,决定调他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任副主任,由张劲夫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同时派裴丽生同志任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同志任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充实加强了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同时,委托国家计委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定出从1956年到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由范长江(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劲夫、武衡等十位同志主持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在原西郊宾馆集中了国内许多知名科学家进行这一工作。稼夫同志在离开科学院之前,仍积极协助范长江、张劲夫同志进行规划的制定工作,经常到西郊宾馆去开会、研究工作。那时,科学院请来几位苏联顾问,搞科学规划时仍由他负责联系。一直到科学院规划快要制定出来的时候,他才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但不久就病倒了。经大夫诊断是被劳症候群,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在青岛疗养了一年半,才恢复了工作。

回想我随稼夫同志在科学院工作的这三年多时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确实获得不少教益,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但是,我这个晚辈向他学习的太不够了,这不能不是终生的憾事。在稼夫同志离开人世之前不久,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他还嘱咐我,你离休后,仍要为我党做一点事情。

稼夫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激励着我继续为党奉献余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